明日朝鮮戰爭與江南的倭寇記憶

吳大昕 *

一、前　言

提到明代的日本，大多數人都想到倭寇。而所謂的這個倭寇，其實又指的是被稱爲明代兩大「外患」「南倭北虜」中的「嘉靖大倭寇」。「嘉靖大倭寇」，指的是自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攻陷浙江台州府黃巖縣，明廷復設浙閩巡視官後長達十餘年的沿海騷動。一般又稱壬子之變、嘉隆(嘉靖、隆慶間)倭寇或中期倭寇[1]。長期以來，嘉靖大倭寇一向被視爲明朝的兩大兵災，其燒戮之慘，不論在官方、士紳以及嘉靖四十年以後所編纂的地方志中，都可以看見這些記錄，從而有「東南罷敝極矣」的印象。成書於清代的《明史・日本傳》對嘉靖大倭寇下了一個定義：「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2]，如今我們從各項記載中，也深信嘉靖大倭寇的組成的確是以中國人爲主。然而，留在非歷史工作者心中的日本倭寇形象，卻從來未曾改變。《明史》將我們看似獨立、特別的嘉靖大倭寇收載於《日本傳》之中。《明史》雖然成書於清代，但直接接受了明末流傳下來的倭寇形象。我們不禁要問，在嘉靖大倭寇期間受到侵害，而且未將「倭寇」歸類日本人的江南人，爲何終明之世，還是將這一事件視爲「日本故事」的一部分，而不將其僅視爲一場民亂。

---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1] 本文的分期，前期指的是自十三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中葉（嘉靖前）侵擾中國、朝鮮的日本倭寇。中期指的是嘉靖倭寇，後期即隆慶以後的海寇。鄭樑生在《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的幾個問題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一書中將倭寇分為前後兩期，以 1552 年為分界。筆者採用三期分界，是以倭寇活動的性質作區分，本文中的「倭寇」一詞的定義為：十三到十七世紀侵擾中國、朝鮮，來自海洋的武裝盜匪集團。至於「真倭(日本倭寇)」的比例多寡，並不是是否稱之為「倭寇」的標準，在此定義下，以嘉靖大倭寇的發生以隆慶元年（1567）作為分界。

[2]《明史・日本傳》（台北：鼎文書局點校本，1979 年），頁 8353。

二、萬曆二十年代的「倭寇騷動」

雖然歷過嘉靖大倭寇的騷擾，但對大部分的江南人而言，倭寇仍只是被定義爲由外地來的、殘忍嗜殺的一群強盜。萬曆二十年（1592），距嘉靖大倭寇發生的時間正好四十年，那場戰亂已塵封於經歷者記憶中。「倭寇」在江南又再度成爲一個陌生的名詞，一度被人所恐懼的倭寇形象，早已被遺忘了。

然而這一年四月，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突然派軍登陸釜山，入侵朝鮮。從四月十三日登陸，在短短十九日內，日軍佔領包括王京（漢城）在內的朝鮮南部五道，朝鮮國王昖放棄京城，逃至平壤。不久再逃至鴨綠江邊之義州，在無計可施下，遣使向明朝告急求援。[3]《明史・朝鮮傳》云：

> 是時倭已入王京，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庫，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於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籬，在所必爭。遣行人薛潘諭旷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且至。而倭業抵平壤，朝鮮君臣益急，出避義州。遊擊史儒等率師至平壤，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渡鴨綠江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以宋應昌為經略。[4]

在獲知日本入侵朝鮮的奏報後，北京方面對突發的「倭寇」事件顯得手足無措。《明史・日本傳》記錄當時明廷所面臨的情況是：「當是時，寧夏未平，朝鮮事起，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5]，沈符德云：

> 關白侵朝鮮事起。建白者，章滿公車。石司馬以集眾思為名，多所採納。其可晒者，如張念華冏卿，議集浙、直、福、粵四省之兵，入海搗日本之巢，已為悠繆不經之甚，旋為言路所駁，謂其騷動江南，罷不行矣。有一妄男子程鵬起者，求往海外暹羅國借兵，以攻關白，可令為師自救，以解朝鮮之困。石司馬大喜，以為奇策，即請於上，加參將職銜，給餉

---

[3] 此次的戰爭，日方稱為文錄之役。而萬曆二十四年的第二次戰爭則被稱為慶長之役。至於韓國則稱此次戰事為壬辰倭亂。

[4]《明史・朝鮮傳》，頁 8292。

[5]《明史・日本傳》，頁 8358。

> 召募。其寮掾二十人，皆無賴椎埋輩也，並授指揮，充中軍旗鼓等官。先入朝鮮約會師之期，索其賂數萬。至閩、廣造船募兵，費餉數十萬，俱匿入蠹中。盤桓海上不發，使為言者論罷輟行。[6]

于慎行也說：

> 萬曆壬辰，倭寇朝鮮，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調播酋楊應龍兵東救朝鮮。……（此段記鵬程起事）播酋不奉漢法，阻兵拒命，朝廷遣使即訊，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調其甲兵出入中土，窺見虛實，縱使有功，何以善後？[7]

各式各樣建議的出現，顯示北京再度陷入的情報缺乏的故事之中。播州楊應龍即是未來萬曆三大征中播州亂事的首謀，萬曆十九年因貴州巡撫葉夢雄建議「改土歸流」，早已顯示出不服的意向，爲此正對簿重慶，論法當斬，[8]在這種情況下，明廷竟然想調其赴韓入援。而程鵬起提出的向暹羅借兵，這種被時人稱「識者聞之，無不駭笑」，[9]這一看來不可思議的建議，竟也可以被全盤接受，實在令人無法想像。[10]結果白費大量兵餉，卻一事無成。像程鵬起這樣因參與公車建言而一夕得利的人物並非一個特例。在朝鮮之役中的爭議人物－沈惟敬，也是經相同的方式得到游擊之位，參與東征，並成爲中日封貢外交中舉足輕重的人物。[11]又因爲北邊不靖，無法抽調長城線上善戰將領，又「詔天下督撫舉將材」參與東征。[12]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得知北京對朝鮮事件所表現出的驚慌與無備。

原本只是兩個外國之間的戰爭，卻因爲朝鮮距北京僅一海之隔，明朝認爲「朝鮮爲國藩籬，在所必爭」，因而決定派軍支援朝鮮；由於遼東總兵李如松正率軍於

---

[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十七，〈兵部〉，頁 438-439。

[7] 于慎行，《穀山筆麈》（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十一，〈籌邊〉，頁 122-123。

[8] 《明史・播州宣慰司傳》，頁 8046。

[9] 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十一，〈籌邊〉，頁 122。

[10] 在《神宗實錄》，卷 256，頁 4752－4753，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丙辰朔辛酉條中記載，向暹羅借兵事為暹羅貢使自請於兵部，筆者認為此次「暹羅貢使」極可能是程鵬起所假冒。

[11] 《明史・日本傳》，頁 8358。

[12] 《明史・神宗本紀》，頁 275。

寧夏戡亂，遂由副總兵祖承訓率軍入援。然而祖承訓及游擊官史儒所率的援軍，[13]卻在不諳敵情的情況下，遭到日軍火銃的突擊而慘敗。塘報傳來戰線已到達鴨綠江邊，倭寇隨時可以通過遼東，進擊北京的消息，至是引發了屬於北京的「倭亂」。[14]明朝立即命宋應昌爲經略備倭軍務，十二月，命剛由寧夏凱旋的遼東總兵官李如松爲東征提督，率師前往救援。二十一年一月，李如松大敗日軍於平壤，一時間看來勝券在握，然而此時李如松與宋應昌卻相互爭功，爲此李如松竟率家兵八百人（一說三千）輕騎深入，希望藉此獨得首功，結果在碧蹄館遭到日軍墊軍擊敗，李如松僅以身免。碧蹄之役的失敗對援朝明軍來說雖然損失不大，卻因此陷入士氣不振，不願繼續前進。日軍則因後援不繼，也無力發動反攻，後撤至釜山。戰況於是陷入膠著。在此狀況下，雙方都有停戰的意願，開始了中日雙方長達三年的外交交涉。

這次的交涉，雙方主要的爭議在於日本希望通商，與中國和親，而明朝則欲藉封日，將日本重新納入朝貢體系之中。然而因使臣沈惟敬刻意隱瞞兩國國情及和談條件，企圖掩飾其交涉無方的實情，加上日方使臣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相互牽制破壞，以致和議雖成，但卻在萬曆二十三年日使小西行長至北京定約時敗漏，最後完全破裂，主和的兵部尚書石星因爲被罪下獄。[15]二十四年（1596）戰事再起，雙方互有斬獲，至二十七年豐臣秀吉病死，日軍撤回；這場「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16]的大戰才告平息。

與嘉靖大倭寇時期相反，這次的「倭寇」入侵，受到威脅的是北京地區，北京甚至因而戒嚴。同時因爲在寧夏地區，「北虜」問題又見擴大，加上九邊缺餉所造成的兵變，北京處於相當緊張的狀態。但這和江南有什麼關係？同時，這次的

---

[13] 雖然在《朝鮮傳》中似乎將此役描述為兩次戰役，但實際上是同一場戰役，史儒為軍前鋒，大敗後日軍直逼祖承訓部，祖單騎逃回遼東。

[14] 有關豐臣秀吉侵韓的過程與相關問題，參見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史語所專刊》61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72 年）。或見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的幾個問題為中心》，頁 523-633。

[15] 見李光濤，〈萬曆二十三年封日本國王豐臣秀吉考〉，《史語所專刊》53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67 年），頁 102-107。

[16]《明史・朝鮮傳》，頁 8299。

戰事和嘉靖大倭寇爲何有關？最大的原因，是萬曆年代的江南社會，其資訊傳播已經更多樣且更迅速，當然也更具影響力了。

嘉靖大倭寇發生的年代，江南社會的資訊傳播，還只有朝廷的命令、口語相傳和書信往來。朝廷的驛傳系統，目的在下情上達，使北京有足夠資訊做出必要的決策，同時也確保地方能確實奉行北京的命令。與其說他是傳播系統，不如說是傳令機構。驛傳的路線雖非自明初便一成不變，但其路線的延伸或改道，主要原因是爲了北京對傳播效率的要求，地方需求並非改變的原因。

另一個傳播則靠私人之間的傳言與書信往來，[17]然而這種傳播方式，使資訊的流通局限在一時一地的一小群人，資訊變成被特定集團所掌握，無法廣泛、自由的流傳，可以說資訊媒介尚未「大眾傳播」化。

資訊媒介尚未大眾化之下，一般大眾對倭寇的認知，也就留在「外地入侵者」的形象上，雖然許多的大倭寇經歷者，記錄下關於倭寇的文字描述，但這些文字記錄，卻因爲未出版或難以購得等因素，一直沒有留傳開來。況且大倭寇平定後，一般人的注意力恢復爲重建家園與社會秩序，可以想見人們普遍想忘掉這個災難，又有誰會去重提這個恐懼的故事。在這種狀況下，嘉靖大倭寇的記憶也就被模糊化了。

然而到了萬曆年間，資訊卻將嘉靖大倭寇的災難重新提出。不同於以往，江南逐漸出現許多報紙形式的資訊媒體。「朝報」的出現象徵這個趨勢的開始。《典故紀聞》云：

> 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知朝政。自成化時汪直用事，其黨千戶吳綬以為洩漏機密，請禁之。後奸人恐不便己私，遂往往禁諸傳報者，然卒有未不傳，亦可笑也。[18]

朝報的目地是在「使知朝政」，而非僅告知相關官員執行命令。成化時的朝報傳播範圍還可能僅限於北京諸官，但《典故記聞》說「後奸人恐不便己私，遂往往禁諸傳報者，然卒有未不傳，亦可笑也」，似乎之後的朝報傳播已擴大範圍了。隨著

---

[17] 參見拙著，《海商、海盜、日本人：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中，第三章〈「嘉靖大倭寇」形象的建立〉。

[18] 余繼登，《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75-276。

朝報傳播範圍擴大，地方官員甚至編派預算雇專員駐京傳抄，逐漸演化爲士紳層的新聞媒體。[19]從流傳至今的《萬曆邸抄》的內容看來，不再只限於特定官員的行政命令，也包括各地的戰報、災荒的發生等新聞；《邸抄》所提供的資訊也不只是在提供官員朝政動態，許多近似小說的文字，足以說明其內容絕非單純抄寫公文而來，而是經過編纂的。這種傳播活動已經有像記者般主動搜集而來的新聞，已經是種讀物，而非公牘、告示了。據王鴻泰從小說所作的研究，《邸抄》不僅在士紳官員之間流傳，一般人至衙門查閱或打聽朝報的情形相當普遍，也因此出現許多人藉傳抄邸鈔，收集各種資訊出版各種「小報」，以滿足民間對資訊的需求。[20]至晚在萬曆中，抄報轉化爲民間的私人營利事業，變成一種新興行業，完全從行政體系脫離。在《邸抄》的傳播下，江南人對發生在全國各地的重大事件和北京方面的反應，可以很快的得知，這也將江南與北京更密切的連結在一起。

抄報的興盛，某方面也反映出明中葉出版業的發展的原因，那就是民間對資訊的需求越來越大了。明初的的商業書坊繼承了宋、元以來的傳統，以福建、浙江和江蘇爲中心。16 世紀後，浙江的湖州和安徽的歙縣亦加入到最佳刻印中心之列。在民間資訊需求增大的情況下，從 16 世紀后期，蘇州、常州、無錫等地書坊也繁榮起來。這些書坊集出版社與書店的功能於一體，基本上以營利爲目的。選題上沒有任何限制與忌諱，只要有銷路，有市場，無論什麼書都出版。[21]出版業興盛加上印刷技術的發達，帶來的是書價降低，彭威信指出：「自印刷術發明及應用以來，中國的書價有下跌的傾向，而以明代爲最低。」[22]利瑪竇說：「正是中文印刷的簡便，就說明了爲什麼這裡發行了那麼大量的書籍，而售價又那麼出奇的低廉，沒有親身目睹的人是很難相信這類事實的。」[23]，因此，不只士紳，一般市井小民也可廉價購得，這使得資訊傳播更爲快速、廣範。

---

[19] 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年），頁 100-111。

[20]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第四章〈資訊網絡的公眾社會〉，頁 309-315。

[21] 參見錢杭，承載著，《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46。

[22] 彭威信，《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頁 717。

[23] 利瑪竇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22。

出版、新聞媒體與人們的求知欲成正比，人們對資訊的渴望是天生的，但在資訊貧乏的年代，受限於沒有有效的資訊來源，求知的企圖便會受限。一但資訊爆炸，人們往往便會想得到更多的資訊。萬曆年間江南社會便是處於資訊來源充裕的時代。現今研究明史的筆記、小說，幾乎都是在此一時期由各地書坊出版的，而《明實錄》大約也在此時傳抄至民間。以營利爲目的的出版業想盡辦法出新書，提供更多的新內容，以刺激市場；而讀者也希望得到更多更新的資訊，兩者交互作用下，江南成爲了全國傳播媒體的中心。

在這樣的環境下，江南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得知全國各地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像發生在朝鮮震動朝廷的戰爭，藉著《邸鈔》很快的便傳到了江南。最晚在萬曆二十年七月，江南已得知此事件。[24]

三、江南資訊傳播下的倭寇形象

在日本入侵朝鮮的消息在傳至江南後，喚醒了江南對倭寇塵封已久的記憶。此時距嘉靖大倭寇已四十年，許多的江南人是從未經歷過倭寇的。在迴避制度下，大部分地方官更是從未面對過倭寇的外地人。加上事起於朝鮮，江南所受到的威脅並不大，也因此未產生多大的恐慌。然而，「倭寇」這個早已被遺忘的名詞，卻在出版業及地方官的支持之下，突然變成一個眾人迫切想得到的資訊。對此時的江南人而言，倭寇已不再是生命財產的威脅，卻變成一種新知。只剩下「殘忍、嗜殺」模糊形象的倭寇，再次介入江南人的生活之中。

由於北京方面仍然不清楚日本此次入侵的目的與路線，懷疑日本侵略朝鮮僅是個牽制作戰，真正的目的在侵略中國。因而要求沿海各省加強戒備。山東首當其衝，首先要求留餉徵兵。[25]這個對沿海武備不足的憂慮，很快的也傳至江南。八

---

[24] 據岸本美緒的研究，北京至江南的最重要的資訊傳播路線的資訊傳播速率大概在一至兩個月間，見岸本美緒，《明清交替　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　秩序問題》，第五章，崇禎十七年の江南社會と北京情報〉，頁 143-195。在《萬曆邸抄》上第一次提及朝鮮之役是在五月條，粗略可知江南應最晚在七月便可得知此消息，見《萬曆邸鈔》（台北：古亭書屋，1968 年），萬曆二十年壬辰卷，五月甲子條，頁 673-674。

[25]《神宗實錄》，卷 250，頁 4650，萬曆二十年七月壬戌條。

月時命江南召募沙兵三千支援朝鮮。前述張念華野心勃勃的征日建議雖不果行，但江南仍受到了不小的影響。《萬曆邸鈔》記載，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 應天府巡撫劉應麟，巡按陳遇文題稱：「倭警告急，蘇松四府議增兵餉等銀一十二萬七千五百餘，每畝徵銀九釐。」[26]

大概從此時間開始，萬曆二十年從北京開始的「倭寇騷動」，逐漸的影響了江南人的生活，當然也引起了江南人對日本的好奇心。對萬曆二十年代的明人而言，發生於四十年前的嘉靖大倭寇，似乎是唯一的倭情來源；也因此引發了對嘉靖大倭寇歷史的探詢，江南做爲明代官員最大的出身地，北京的重大問題當然成爲被大眾關注的焦點，藉著封貢問題所引發的輿論，自然也成爲眾人討論與關心的問題，出版業當然不會放過這樣有利可圖的機會。

明代的嘉靖大倭寇專書，幾乎都在萬曆二十年代出版，特別是萬曆二十一年中日雙方開始進行外交交涉的時期。倭寇史料中最重要的《籌海圖編》、《江南經略》雖然是在嘉靖年間胡宗憲的召集下編成，但也到此時才在民間廣爲流傳。除此二書外，更多的史料則是到此時才由私人收集出版。這些書被編寫出版的原因是爲「鑑古知來」，希望藉嘉靖大倭寇的經驗，來面對現今的日本侵略。

本節將分析現今留存的《皇明馭倭錄》、《備倭記》、《嘉靖倭亂備抄》、《虔臺倭纂》、《倭情考略》、《倭奴遺事》、《倭志》等倭寇史料出版品，上述的出版品，是現今倭寇史研究中重要的參考資料。這些出版品按其篇章結構皆可劃分爲以下幾個部分：第一部分爲由編者或書坊請人所寫的序，講述著因當今倭寇入侵朝鮮，江南人士應當居安思危。回顧以往倭寇對江南的殺戮，更應小心防備，以免江南再陷大禍之中。同時，也不必因害怕倭寇，與倭和好，喪失天朝國格。文中普遍充斥著相當自信的筆調。成書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的《虔臺倭纂》云：

> 故始倭原，惟貢及使，初以好合，故倭好次之。好必市，紀倭利。利必爭，紀倭變。變必詐，紀倭巧。巧必絕，紀倭防。防必勝，終倭績。而議附焉。示弗議固弗成也。是纂之次第也，簡而不遺，經武所便，聯以

[26]《萬曆邸抄》（台北：古亭書屋，1968 年），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卷，春正月〈增派蘇松四府兵餉〉條，頁 728-729。

辭于軍，雖然倭果終好乎？[27]

其成書的目地在使讀者知倭情，知倭好。二年後由揚州知府郭光復出版的《倭情考略》也是以同樣的目地所編成的：

先年汪直輩犯浙、直，卒為梅林諸公所大創，一時奔潰之眾，即我牧夫市兒，咸持瓦石擊傷之，卒令無一倭生還者。夫非以歸路難乎。今倭竊據朝鮮，雖日窺伺我中國，然年來沿海一帶稍稍有備矣，彼豈遽敢稱兵入犯？即入，而我水戰以挫其先鋒，焚舟以絕其去路，倭啟能得志於我哉？惟是江北承平日久，民不習見兵革，一聞警息，鮮不股慄，則以未知倭情故也。兵法貴知彼知我。夫所謂彼我者情也，知其情則知有所以禦之，可無懼倭矣。不佞叨守維揚，愧乏綢繆計。每閱《籌海編》及舊所考聞，得其倭情之略，因彙集成帙而授之刻曰：《倭情考略》刻成徧布軍民，俾知倭情大概若此。萬一入犯，彼以其狡，我以其謀伐之。彼以其奇，我以其正破之。彼以其分，我以其合勝之。彼以其緩，我以其亟攻之。隨機應變，可弄倭奴於掌股之上，當使牧夫市兒仍持瓦石擊傷之，令如先年無一倭生還可也。誰謂禦倭難哉？[28]

海南諸國，倭為最強悍。其人輕戰樂死，且黠而多智。自國初不以荒服治之。然向者入訌，志在俘掠而已。今其形勢張設，大非昔比，蹂踐我屬國，偽為乞封而尋倍盟窺伺之心，殆將叵測。雖然倭即來，無能為也。聖朝億萬之儲積之內帑者，將悉發以繕兵，燕越彪搖武猛、控弦扼虎之士雲集遼左，怒髮磨牙將蹈藉關白之肉而飲其血恨，不速擊之為快。島奴不悔，則隻舸不返之禍耳。所深慮者，沿海編氓，靡識倭狀，將以為是魍魎不可知之物，氣先奪而彼得以恫嚇，肆志焉。昔年倭直擣揚之海，安民跪受屠戮，若刈草菅，裸辱婦女。有少年恚甚，舉大杖奮格殺之，

[27] 謝杰，《虔臺倭纂》，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序〉，頁 227 上-下。

[28] 郭光復，《倭情考略》，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335-336。

> 於是眾驚喜曰：「倭可殺歟」則相與挺刃追逐，而數十倭之命殲於食頃。故倭亦人耳，知者易之，不知者懼之。是以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知倭者知其狀、知其術、知其嗜好、知其言語。知其狀可以辨，知其術可以趨避，知其嗜好可以餌，知其言語可以諜，則倭情得矣。語曰百聞不如一習。蠶形似蠋，然女子執蠶，丈夫見蠋而毛起，不習也。如捕蛇師雖夢蛇而不怖畏，習之也。習則無懼而後可制人而不制於人，得勝算焉。[29]

從兩文的內容看來，兩書都是要介紹何謂「倭」，更明白的告訴讀者，倭即嘉靖年間入寇江南者，而當時所造成的破壞，造因於對倭寇的恐懼與錯誤認知。同時期出版的《皇明馭倭錄》，作者王士騏則云：

> 記倭事者，有薛俊之《考略》，有王文光之補遺，而鄭若曾之《籌海圖編》加詳焉。臣不佞讀之，而嘆其用意之勤也。已稍稍參以國史，使恨事略者百不得一，而一且失真。士大夫不考於先朝之故事，而動以野史為正，所誤多矣。乃就國史中一一拈出，自高皇帝以至穆廟，列為編年謀之。[30]

簡單的說王士騏是想以國史，即《實錄》的記載來訂正薛俊等人的錯誤，達到「可以廣朝士之見，可以正野史之繆。雖臚列故事，而或與今日東征事機頗相發明」[31]的目地；這顯示此書的編寫動機，是因朝鮮之役的騷動，而帶來朝議的混亂而興起的。從上引文句中，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這些著作都是因朝鮮之役而編纂的。由於認爲「所深慮者，沿海編氓，靡識倭狀，將以爲是魍魎不可知之物，氣先奪而彼得以恫嚇」，因而這些倭寇專書出版目地，是希望藉著重新了解嘉靖大倭寇的歷史，學習如何對抗倭寇，知道倭寇並非神鬼，並不難以討滅。一但「倭寇」真的又入侵江南，江南人藉著嘉靖時成功勦倭的經驗，可以避免再度出現「亡奪

---

[29] 徐鑾，〈倭情考略序〉，《倭情考略》，頁 337-338。

[30] 王士騏輯，《皇明馭倭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部，第五十三冊，〈皇明馭倭錄小序〉，頁 3 上。

[31] 同前註，〈皇明馭倭錄小序〉，頁 3 上。

精魄如嘉靖之季者」[32]的情況。從這些序言我們可以感覺到，在經過四十年後，江南對嘉靖大倭寇的恐懼似乎是恢復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前的狀況。

第二部分，通常有一篇由萬曆年間的人士所寫的日本傳，各書名稱不同，如《虔臺倭纂》的〈倭原〉、《倭情考略》的〈倭國事略〉，主要的內容在談述日本的歷史沿革、政治體制、生活習慣、地理環境與地方政區劃分以及中日通貢的歷史。較完整的作品還附有中日文日常用語讀音對照表。各書撰寫的體例不一，有特別描述日本風土民情者，也有的將日本傳寫成中日關係史者，並直接將嘉靖大倭寇的寇掠時間、地點，大略抄寫於後。書中的日本知識大部分都雷同，這是由於文中對日本的知識，大多來自《籌海圖編》一書，以及前朝正史中的日本傳。

《籌海圖編》一書的〈倭國事略〉一文，可說是大部分日本傳最主要的參考資料。這篇文章，是抄寫自嘉靖初年所出版的《日本考略》一書[33]。此書是由浙江定海人薛俊所傳寫，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九年（1523）由王文光所增補出版的。在序言中，王文光敘述道，薛俊寫作此書，是因爲目睹嘉靖二年寧波事件所帶來的災禍。[34]寧波事件是單純因明日封貢所引起的亂事，也是倭寇活動轉型的關鍵事件，當時倭寇活動尚未加入複雜的因素，因而此文中的倭當然指的是日本。以嘉靖初年明人對日本的認識而言，此文所能提供的知識可說是無人能出其右，其內容包含了上述日本傳的所有部分。在《籌海圖編》選入後，又爲這些日本傳記參考，構成了最重要的內容，例如《日本考略》中記載著日本的戶口田賦：

畿內郡

---

[32] 同前註，頁 28。

[33] 薛俊著，王文光增補，《日本考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史部，第二五五冊。

[34] 同前註，頁 266 下。嘉靖二年（1523），寧波發生了明代中日關係史上十分重要的「寧波事件」，由割據日本中國地方的大內氏和割據近畿地方的細川氏各自所派出的貢使，先後到達寧波。按此前明代處理的慣例，以先來者為正使，但因為細川氏貢使宋素卿賄賂當時市舶太監賴恩；由於處理不公，導至兩隊貢使相互殺伐，波及寧波、紹興各處，備倭都指揮劉錦戰死。此事導致世宗下令廢天下市舶司，中日朝貢中斷十七年之久，使得正式合法的海外貿易管道完全斷絕。

驛

凡四百一十四

戶

凡七萬有奇

課

凡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35]

由於《籌海圖編》是抄錄的，出現相同的文字自屬當然。然而，同樣的文字卻在五十年後出版的《虔臺倭纂》中一字不改的出現，而且還誤將原本只記畿內一道的數字變成日本全國的戶口課額，因而得出日本「所謂郡者，不足當中國之一、二都；所謂州者，不足當中國之一、二縣；所謂道者，不足當中國之一、二府。合其畿道，不足當中國之一、二省。」的見解。[36]大量的相互抄襲，也使得各書對日本的認識更加一致化。

構成日本知識來源的，還有作者們所「聽說」的「真實日本」。從這類日本傳的內容看來，這些作品對日本的認識在明代前最爲正確，其後便錯誤百出；這和明朝一直以來對日本的認識不足，又長期欠缺交流的情況一致。[37]薛俊的日本傳雖提供了一部分的知識，但也只到嘉靖初年。爲了填補此後所造成的歷史空白，特別是新近「關白」豐臣秀吉蹶起的故事，各書都搜集了許多的「傳聞」，這些傳聞，仰賴從事明日貿易的走私商人。《虔臺倭纂》便承認：「其所考者，率出譯者之口

[35] 同前註，卷一，頁 493。

[36] 謝杰，《虔臺倭纂》，〈倭原〉，頁 229 上。

[37]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明史・日本傳》中，可參見鄭樑生，《明史日本傳正補》一書中的逐條討論。事實上我們可以將《明史・日本傳》，看作是萬曆出版倭寇作品脈絡下的產物。雖然說《明史・日本傳》是清代所編纂的，但其編纂的脈絡卻直接承續了明代人對日本的認知。我們可以發現，對明人來說，在朝鮮之役前，雖然已發生過倭寇問題，他們對這個東方的島國似乎一直沒興趣了解，這多少也可以說明嘉靖大倭寇的經歷者，並沒有將日本與倭寇做直接的連接，所以才沒有對日本進行深入的認識。

而已。」[38]在熟悉日本史的人看來，內容根本就是錯誤百出，正確性相當低，然而作者們卻各自吹噓其作品內容的權威、正確性，甚自還「校比」他書日本傳的的異同。[39]例如其中的有關日本國王的敘述，部分的作品都以「山城君」稱之，實際上指的是此時早已被廢的足利幕府（1338-1573），而非日本天皇，這當然是因爲永樂年間所封的日本國王，正是足利幕府將軍。所有的傳紀都知道這位「山城君」已經失權，大權旁落地方，但有一部分記載卻提及豐臣秀吉的「關白」一職是由「山城君」所封，因而「山城君」似乎又指日本天皇。這樣的情況，主要是因爲足利幕府與天皇所在地皆在山城（京都府），因而導致明人無從了解。《虔臺倭纂》云：

> 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互相吞噬，今為豐後頗強，併肥前六島有之。關白又弒其子而自立，威脅諸道倭，亦無實主矣。今之入寇，率關白主之，於山城君無與。山口併石見、長門、出雲等州，號山口君。出雲奪歸其地，號出雲君。出雲為陶殿所殺，至嘉靖丁巳（嘉靖三十六年，1557），豐後君又殺殿而自立，今則屬之關白者。[40]

《倭情考略》則說：

> 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明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併肥前六島而已。山口、出雲以貪滅亡。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可也。[41]

《日本志》也說道：

> （日本）諸州郡統於出雲、豐後、山口三軍門。三軍門相翦剽，國分為

---

[38] 謝杰，《虔臺倭纂》，頁 229 上-下。

[39] 王士騏輯，《皇明馭倭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史部，第五十三冊，頁 219-226。

[40] 謝杰，《虔臺倭纂》，頁 230 上-下。

[41] 郭光復，《倭情考略》，頁 343 上。

三。[42]

三段文字的內容相仿，大體上都是在說山城君大權旁落，出雲、山口、豐後三軍門三分其國。然而，這些敘述實與日本的「真實」無涉。他們所說三分日本的三國，實際上是僅割據日本九州一帶的諸侯，從未三分日本。而有關關白（即豐臣秀吉）的描述卻緊接在豐後君之後，說他是殺豐後君之子自立。就豐臣秀吉的史蹟來看，他所殺的是織田信長的二子，根本與豐後無關，更別說秀吉並非九州人，而是出現今日明古屋縣一帶了。

由於這次的出版風潮，是起因於朝鮮之役，介紹日本的此部分也就相形重要，結果是普遍的影響了明人對日本已經很缺乏的認識。從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作品真實性與消息來源都不可靠，對日本認識的缺乏，是明朝一代的普遍情況。于慎行便說：

> 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台諫部司上疏力諫，日無虛牘，爭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汎論事理，至於日本沿革，絕不考究。有謂祖宗絕其封貢，兩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覽之為之失笑。日本在洪武初年雖絕其封貢，至永樂以後，即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若干號。六年一貢，齎勘合而至，人舡貨物皆有定數。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來耳。奈何為兩百年來不許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長官，類如朝鮮，可考而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從一、二舶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以洪荒刱造未經締搆者，尤可笑也。四夷封略在禮部各司，大司馬石公徒欲取效，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為何國，關白為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喃囈，以此禦難，何以為國？可為仰屋竊嘆者矣。[43]

于慎行此話在說北京朝廷對日本的認識情況，但我們也可以藉此了解明人對日本膚淺的認知，連明與日本曾經存在百年的通貢關係都不知道。更有趣的是，在上述引文中，于慎行看來是以禮部的案牘來批評朝臣關於日本的知識，但在實際上，其所謂「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長官，類如朝鮮」便是個錯誤的知識，此時的日

---

[42] 劉鳳，《日本志》，收錄於《倭志》，頁 445。

[43] 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十一，〈籌邊〉，頁 124。

本，早就沒有州郡長官，正在步入以農業生產力（石）爲封土單位的封國制。而「從一、二舶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以洪荒刱造未經締搆者，尤可笑也。」的論述，也正好與事實相反，舶商的資訊反而較爲正確，貼近當時日本的實態，所謂「洪荒刱造未經締搆者」，正是在反映變化後的日本。只不過因爲明代對日走私貿易主要是在九州進行，舶商的資訊來源明顯出於日本九州地區，因爲常常將薩摩、豐後兩地的割據諸侯視爲日本朝令所出，實際上九州的諸侯是從未有權控制朝政，而這也正是日本傳記中出現描述三軍門割據日本形象的原因。[44]

第三部分，主要內容是講述嘉靖大倭寇的歷史，這部分可說是嘉靖大倭寇史料中的精華部分，通常有兩種編纂方式：一種是收集嘉靖大倭寇的經歷者所傳述的文字，大多是個人經歷，都搜自未出版的文集，同時又收錄了許多大倭寇時期官員的奏疏與對倭寇的看法，體例上大多是史料類纂的形式，不加更訂。光是《倭志》一書，便收錄了嘉靖到萬曆二十一年之間大大小小二十餘篇獨立史料，從大倭寇的活動與兵防提要，到明臣出使琉球所得的日本哨報，以及萬曆二十年代爲備倭所發佈的軍事命令都被收錄，其間也不見用以連續的文字。可能因爲各家書坊相互競爭的關係，各書中選編的記載常常是特別、難得一見的記錄，也因爲如此，這些被選的記錄也就常常只侷限一時一地的見聞，也就暴露出發生嘉靖大倭寇時的恐慌所留下的混亂記錄。

另一部分的作品則以編年體的體例，詳述嘉靖大倭寇的始末。這類編年作品，大部分也是選材自《籌海圖編》一書，或參考嘉靖時期的著作而來。編排的標準，是根據出版地來選材，例如《倭情考略》一書，因爲是揚州出版，因而只收錄江北倭寇的記錄，而自稱「閩越人」的黃俁卿所寫的《倭患考原》[45]，則偏重浙東、閩北的倭寇活動。另外，由於《實錄》開始傳抄於民間，[46]也有出版商以《實錄》

---

[44] 近年有學者接觸了這類書籍，如王鐵均，《明代的倭患與中國的日本學研究》（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1，頁 117-122）。但認為明代人因為倭患而使「研究日本的相關著作無論在數質還是質量上都是前朝無法比擬的」，將會過份主觀的使想像的世界與真實的知識混為一談。出版品中當然有真實，但更多的只是混亂，從筆者的觀點而言，研究日本根本就不是作（編）者與出版者的目的。

[45] 黃俁卿，《倭患考原》，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46]《實錄》傳抄民間，主要是因官員謄寫副本時，私自抄出所至。萬曆二十四年皇宮大火，燒

* 資料來源：蔡汝賢，《東夷圖說》。圖中的日本人形象與《倭寇圖卷》中的倭寇形象幾乎完全相同。

中有關倭寇的部分，出版了《皇明馭倭錄》[47]一書，此書內容完全抄自《太祖實錄》到《穆宗實錄》之中，關於日本與倭寇的條文，僅刪除官員的官名部分。

平定嘉靖大倭寇的史實，也是這個部分常見的，就如同各書序言所說，宣傳嘉靖大倭寇獲得勝利的經驗，是他們重要的目的。至於倭寇入侵中國的航路、風向汛期、補給方式，以及倭寇的武器與戰鬥方式，以及明朝沿海的軍備佈置、經費來源，也都有論及，雖然說並非是每本作品都有選擇這一部分，但內容完全抄自《籌海圖編》、《江南經略》、《海防圖考》等書，大部分都沒有更特別的新知與增訂。

這三部分，構成了萬曆間有關嘉靖大倭寇出版品的基本架構。仔細閱讀時，卻會發現前兩部分和後兩部分對「倭寇」的定義完全不同，唯一連結前後兩部分的，便是「倭寇」這兩字。嘉靖年代的記錄，雖然對倭寇不甚了解，但幾乎全都認定大倭寇的參與者以中國人爲主，同時將嘉靖大倭寇的起因歸之於王直等私商倡亂以及沿海奸民的勾引島夷，從不提及有關日本的問題。[48]既然各書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嘉靖大倭寇，那麼在此前所加的日本傳便因而顯得不倫不類，因爲從嘉靖年間的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和日本人的野心有什麼關係，那麼知道日本國情對了解嘉靖大倭寇便無意義。反之，既然這些作品是在警告世人當前日本的威脅，那麼用嘉靖大倭寇的倭寇形象來說明日本人的恐怖也顯得非常奇怪。更奇怪的，這些因應日本侵略朝鮮的出版品，對發生在朝鮮的戰事，幾乎一字未提，只有在序

毀《實錄》，因而命申時行等主持謄抄副本，見黃彰健，《明史研究叢稿》（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356-363。王士騏當時任職於兵部，可能也參與了此次活動，有機會抄錄這部分的資料。

47 王士騏輯，《皇明馭倭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48 雖然做為嘉靖大倭寇最重要的文獻《籌海圖編》一書中有關於日本的記載，但也並未被編為「寇原」的主要內容。

中才會提及朝鮮問題。

當然，因萬曆年間日本侵韓而做的文章，與嘉靖年間的倭寇記錄，立場原本就不同，然而編者卻將兩者合一，同時，這些出版品的內容中，大多抄襲前人傳述，特別是《籌海圖編》，因而有許多錯誤，例如在武備的部分，同時期方志上早已修正的軍事佈防與官員的設廢，都沒有提及；顯示這些出版品的編纂似乎僅講求出版效率，並未進行考證的工作。

這類出版品能在市場上推廣，其立足點便是江南人大部分從未了解「倭寇」是什麼。在上一章中筆者曾提及，嘉靖大倭寇的記載是在混亂與資訊缺乏下完成的，事實上誰也沒有確認過倭寇，而倭寇中有中國人這種記載，是以一種新發現的觀點被記錄下來。加上資訊傳播能力有限，「嘉靖大倭寇不等於日本倭寇」的這種認識並非普及於所有的江南人，而外省語言的隔閡更容易造成倭寇是日本人的假像；因爲大部分的大倭寇參與者來自福建、廣東，而非江南人，因而對江南而言，幾乎是可以把外地人通稱爲倭寇的。因此即便是經歷過大倭寇的人，他們對大倭寇的認知可能還比不上二十世紀的倭寇研究者。加上事隔三十年，記憶早就模糊，剩下倭寇嗜殺的形象，這也就是萬曆年間的書坊能以故紙新編得利的原因了。

這些出版品經過市場販售流傳，結果促成嘉靖大倭寇的形象再一次地被重新定義。或者應該說，倭寇被大多數人正式認知爲日本人。

許多的明人筆記中提及日本與倭寇的關係時，就如《萬曆野獲編》那樣，再次以新發現的口吻說道：

> 嘉靖間入寇閩浙者，乃島中賊倭，如中國洋船，其國主不及知也。[49]

這說明倭寇已被廣泛的認定爲日本人的同義詞，因而這個早已在嘉靖時便出現的結論，才會被重新「發現」。然而這樣的發現，並未能動搖倭寇等於日本人的情況。《萬曆野獲篇》的作者沈德符，對江南因日本侵韓喚醒嘉靖大倭寇的恐怖記憶，因而增加武備時說：

> 所幸彼國安富，遠過中國，向來許多張皇，真是杞人之憂。而朝鮮、日

[49]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七，〈兵部〉，頁 437。

本，向為與國，且世婚姻，特關白一人黷武，近已寧帖，寂不聞交兵事矣。[50]

沈氏認爲日本侵韓，是日、韓兩國之間的私鬥，日本根本沒有進攻中國的打算。因而認爲政府爲防倭寇的許多「張皇」，是「杞人之憂」；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此時倭寇已不再是專指嘉靖時的私商海盜，而專指日本人了。

四、社會想像下的倭寇

除了類似「史料匯編」的作品外，還有一種傳播範圍與讀者群更廣的出版品－小說。這些以嘉靖大倭寇爲體裁的小說，從內容與書寫方式，可說是「時事小說」。雖然它們成書時間在萬曆時期，不能說是報導時事的小說，但如果將這些小說的出版放在日本侵韓所引發的出版風潮，則其「報導時事」的意味依然濃厚。

根據學者對時事小說的研究指出，時事小說的特色有三：一是成書迅速；二是多抄文獻；三是結構鬆散，文采不彰。[51]這種類的小說，主要的目的是以小說的形式報導事件本末。除了以小說的形式出版外，這些小說幾乎可說是前述萬曆倭寇出版品的一部分，以下將以《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與《胡少保平倭記》兩部小說來討論。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52]現今已殘缺，作者、卷數皆不詳，爲鄭振鐸所收得，路工云：

《戚繼光平倭志傳》，明萬曆年間建陽刊本，上圖下文。此書是鄭振鐸先生生前搜集到的，鄭先生十分重視，稱為「奇書」。[53]

雖然說是一部小說，但從現存的殘卷看來，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筆記。雖然具有章回的形式，但各章各自獨立，相互之間沒有承接性，而且各章回的故事，

---

[5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七，〈兵部〉，頁 436。

[51] 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收錄於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編，《小說戲曲研究第三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0 年），頁 181-221。

[52] 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年）。

[53] 路工，〈古本小說新見〉，收錄於《訪書見聞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159。

篇幅都相當短，幾乎不超過一千五百字。從書名看來是記述戚繼光（號南塘）勦平倭寇的故事，但實際上戚繼光的武功並未見多大的篇幅，在現存三十五回的故事中，戚繼光的故事僅佔十一回，不到三分之一。此書的內容，主要記載浙江、福建地區的嘉靖大倭寇始末，全書以王直與各地官員鬥智鬥力的故事爲主，除了幾位重要的人物，如戚繼光、王直、張經、胡宗憲與趙文華外，大部分的人物都是虛構。像是〈官軍賣和王五峰〉中，說到錢御史主張賄賂王直以求王直放棄進攻杭州城。[54]然而不但王直從未寇掠杭州，當時杭州的主事官員也找不著這位錢姓的官員。而文中所述率僧兵打敗王直的參政陳應魁和都司戴祥海，也不知是何人。僧兵保衛杭州城一事並不是虛構，但當時的指揮應爲吳懋宣。[55]而書中重要人物，也是大倭寇中著名的貪官阮鶚，也在文中出現在不對的地點與時間。如在〈阮都院奉命入閩〉一篇，寫嘉靖三十五年四月阮鶚被任命爲福建巡撫，到處搜括財富的故事，[56]但阮鶚撫閩一事在嘉靖三十六年，三十五年四月至五月時阮鶚正難堪的被倭寇包圍於桐城縣城內，不可能到達福建。[57]關於戚繼光的事績，也常常有時間地點的問題，可以說此書是單純虛構的小說。

從內容看來，此書的重點是在描述官員的無能與腐敗，可能因爲充滿了批評，所以不用真名。相反的在戰事中死事者，如宗禮等人，皆真實可考。幾乎可以說此書是在描述官場的黑暗，嘉靖大倭寇只是一個舞臺而已，因而文中的倭寇形象，也就簡單的塑造成日本侵略中國：

> 日本國國主親弟盡恭侯，好在海中閒耍，不□（慮？）柯分守、盧都司二人[58]以為盜賊，妄虜將去冒功行賞。[59]

爲此日本國主派使請於王直、徐海，希望救出其弟，結果仍無法救，於是日本派

---

[54] 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官軍賣和王五峰〉，頁 449-453。

[55]《萬曆杭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七年刊本影印，1983 年），卷六，〈國朝事紀〉。

[56] 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阮都司奉命入閩〉，頁 470-472。

[57]《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五年五月丁丑條。沈符德，《萬曆野獲篇》，卷二十二，〈都撫〉，頁 555-556。

[58] 指的應是時任閩浙海防兵備道的柯喬與盧鑑。

[59] 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頁 441。

軍進攻中國，引發了嘉靖大倭寇。像這樣簡單明瞭的將大倭寇的起因，說成日本國王爲報皇弟被殺之仇，出兵侵略中國。對大多數的閱讀者而言，這樣的敘述自然較複雜的論敘更容易被接受。 然而縱觀全文，卻看不到任何對日本人的形象的描述，只有看見王直個人過人的智謀而已。書中將倭寇所有成功的行動，都寫成因王直的謀略所致，日本人僅是殺人者而已。如果不看書名，甚至會認爲書中的主角是王直，而非戚繼光。於是，此書刻劃了日本人愚昧的形象，連被殺時都是如此：

大凡倭寇廝殺，勝則任意殺戮，敗則跪而求斬，此其故態也。[60]

把倭寇描述成這樣愚昧野蠻，也就是在提昇王直存在的意義；有趣的是，戚繼光的主要戰功是在浙江與福建，並未參與勦滅王直一事，卻如此加重王直的地位，真不知散失的結尾如何將兩者做一結局。

《胡少保平倭記》[61]，書題錢塘西湖隱叟述，作者生平不詳，但從「錢塘西湖」四字看來，顯見作者爲杭州人。這部小說的本書的內容在記錄胡宗憲平定倭寇的功蹟，同時爲胡宗憲因牽涉嚴嵩案而被殺一事做翻案。其原始版本因爲收錄於周清源《西湖二集》一書中的〈胡少保平倭戰功〉。[62]書中參考了大量的史料及傳聞，書末更詳細的抄錄了萬曆二十一年兵科給事中朱鳳翔上書平反胡宗憲一文。實際上，因朝鮮事起，許多嘉靖年間在勦倭中有眾大戰功的官員，都受到加封或平反的昇蔭，連一直爲神宗所不喜，抑鬱而終的戚繼光，也在這一年以「血戰殲倭，勳垂閩浙」之功得到平反。[63]這樣看來，本書做爲「時事小說」是當之無愧了。

由於目的在宣揚胡宗憲的事績，而胡宗憲的勦倭又以擒王直、殺徐海爲首功，因此自然將倭寇的發生歸罪於王直勾引諸倭。看起來似乎正確地敘述倭寇發生的原因，然而除對王直、徐海的描述外，全書中所表現出的倭寇形象，卻是完全的日本人，全書所稱的倭寇，通通稱爲酋長。這些日本人之所以能搶劫中國，無往不利，是因爲王直的機智與威信。書中一大重心在敘述胡宗憲記勦徐海的過程，

---

[60] 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謝介夫單身戰寇〉，頁 463。

[61] 西湖隱叟，《胡少保平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62] 周清源，《西湖二集》（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年）。

[63] 《神宗實錄》，卷 258，頁 4796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條。

大致上是參考茅坤所寫的《紀勦除徐海本末》，[64]以及徐學謨的〈王翹兒傳〉，[65]書中關於徐海的內容都是二文的擴充，大大提高了徐海寵妾王翠翹在事件中的地位，最後以徐海被殺，王翠翹投江爲此段結局，增加了一點英雄美人的浪漫。相當值得注意的是，在眾多的倭寇故事中，徐海與王翠翹的故事流傳最廣也最長久，這個故事的各種版本流傳範圍竟達廣西、越南與日本，而且由海盜與妓女的異聞演變爲一才子佳人小說。[66]足見小說讀者的喜好與小說的傳播能力。[67]

王翠翹的故事，一般公認最早的文本是茅坤《紀勦除徐海本末・附記》一文，但是，在《紀勦除徐海本末》的本文中，對王翠翹及其妹綠珠僅以徐海「兩寵妾」帶過，而在《紀勦除徐海本末》的〈附記〉中，卻是清楚的交代了王翠翹的生平，根據陳益源的研究，這篇〈附記〉並非由茅坤所寫，而是後人所加，因爲目前《紀勦除徐海本末》流傳的各種版本中，這篇〈附記〉或有或無，同時其內容有胡宗憲酒後亂性侵犯王翠翹的故事，不太可能出自身爲胡宗憲賓客的茅坤之手。考其文本，竟是馮夢龍《智囊》中的〈王翠翹〉。[68]這個傳奇的最早版本，則是徐學謨的〈王翹兒傳〉。[69]這篇〈附記〉也一字不漏的被李詡《戒齋老人漫筆》所收錄，[70]最後出現在《胡少保平倭記》中。傳奇小說與筆記史料的相互引用，使真實與虛構混合，侵入了明代人的倭寇記憶之中，產生的巨大的影響力，也突顯了萬曆年間社會對倭寇的認知是如何建立的。[71]

---

[64] 茅坤，《紀勦除徐海本末》，收錄於采九德，《倭變事略》，頁 141-149。

[65] 徐學謨，《徐氏海偶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6] 這些版本中以青心才人，《雙奇夢全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最為重要，成為大量小說、戲曲的底本。故事便為金翠翹（即王翠翹）的一生，結局是與虛構舊時衷情之人金重團圓，已與原本故事相差甚遠。

[67] 見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1 年）。

[68] 馮夢龍，《馮夢龍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十冊，卷十六，〈王翠翹〉，頁 628-629。

[69] 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頁 26-31。

[70] 李詡，《戒齋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五〈蔣、陳二生附王直。徐海妓〉，頁 185-190。同樣的文字故事也出現在王世貞，《續異豔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中所收的〈王翹兒傳〉。

[71] 關於虛構與真實交錯而造成的社會影響力，安貝托・艾柯有精彩的敘述，見安貝托・艾柯著，

我們不難想像，這樣的時事小說對倭寇形象的塑造能力。倭寇變成了被一兩位中國奸民所利用的日本人，甚至輕率將王直描述爲日本國號令之所出。[72]結果，倭寇不因王直的出現而改變其日本人的形象，只是因日本人憨直，易受利用，因而服從於王直的領導。更奇怪的是，殘殺中國百姓等事，也非王直等人指使，而是不知教養，嗜殺的日本人所爲，似乎倭寇所犯之罪就是它是日本人，一但王直被擒，失去了中國人指揮的日本倭寇，也就只能等著被消滅了。這種對日本人極度歧視的看法，幾乎可以說是明朝對「日本人」認知的寫照。對這種日本印象，明人有人寫到：

> 蓋造物者突開東南幾番殺氣，而華人導之，禍遂裂耳；詎云：「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哉？[73]

懷疑日本人喜盜輕生、好殺乃是天性的印象並非真實，但這永遠只是懷疑。於是，日本印象就被建構了。

在這樣多談述嘉靖大倭寇的出版品中，我們會驚訝的發現並沒有太多關於朝鮮戰爭的出版品問世。這個奇怪的現象，原因可能是朝鮮的戰事對江南真的是很遙遠的故事，並沒有燃眉之急。反到是從萬曆二十一年開始的「東封問題」，成爲當時輿論最關心的事件。從《萬曆邸抄》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封貢事的報導無論在篇幅、字數上都遠遠多過關於朝鮮戰事的記載，這說明封貢一事才是當時最受注意的事件。從這個角度審視前述所有的倭寇出版品，便可知道「倭人狡詐、好殺」等等的形象爲何在所有的文字中都被提及，因爲跟這種狡猾又不守信的國家交涉封貢，無疑是在洞開國防大門，「倭欲無厭，夷信難終，封則必貢，貢則必市」。[74]結果可能又引發另一次的寧波事件，根本不能平息倭亂。這種想法，可能也是引發大量作品出版的原因。

相對於江南地方對倭寇的重新定義，福建與廣東地區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由於長期比江南更自由的與外國進行貿易交流，對倭寇一詞的使用遠比江南

黃寤蘭譯，《悠遊小說林》（台北：時報文化，2000 年），〈虛構條文〉，頁 160-197。

[72] 西湖隱叟，《胡少保平倭記》，頁十四。

[73] 張燮，《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點校版，2000 年），頁 119。

[74]《神宗實錄》，卷 271，頁 5028，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條。

更謹慎，嘉靖大倭寇平定後，大部分的記載上多改用海盜、海寇來稱呼這全群騷擾沿海的武裝集團；顯示海外活動的確使對日本的認識更加清晰。從倭寇研究中關於「倭寇以中國人爲主」的討論，主要引用的便是福、廣所流下的史料，也是一個佐證。福、廣並沒有出現如江南那樣的出版風潮，也就不把倭寇就是日本人這樣的結論沿用了。

在《明史・日本傳》裏，關於嘉靖大倭寇的部分，提及福、廣兩省倭寇的內容，僅有兩條，相較於江南與浙江的記載，可說僅是附帶提及。最大的理由，正是因爲這兩省並沒有發生像江南那樣的出版風潮。即便有作品記載倭寇，但也因不用倭寇一名（如改用海寇等），而變得與倭寇無關。這些因素，恐怕就是使《明史・日本傳》的編纂者在收錄史料時，對福、廣兩省僅略爲提及的原因，對筆者而言，這也清楚地說明了爲何明代倭寇的形象，幾乎是以江南人的認知爲準，而相較之下對倭寇描述用詞更正確的福、廣地區記錄，卻從未成爲明人所認知的倭寇，萬曆年間出版業的興盛的確促成了明代倭寇形象的成形。至此，倭寇一詞所代表的意涵，由嘉靖時期的一個混雜集團通稱，再度成爲專指日本海盜。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狡詐、好殺、不可信賴」的形象也同時形成，造成了中國人此後對日本人的印象。

這樣的記憶，在萬曆之後繼續流傳，從《萬寶全書》一類日用書中，[75]我們持續看到這個形象的流傳，在日用書之中，持續存在著「倭」的形象，文中的倭國介紹，也延用著萬曆年間所塑造的倭國，就自此流傳至今了。[76]

當我們回復到當代倭寇史的研究中看看學者的研究，便會發現明代所留下的記憶有多大的影響力。陳立夫在爲王婆愣的《歷代征倭文獻考》一書所做的序中說：

> 至於倭寇之始末，尤足令人憬然；湯和沿海設衛，金山衛與瀏河口並與衣冠之盜是也；其後徐海汪直平，而倭亦戢其鋒；由今思昔，內奸之亟待肅清；二也。觀鹽邑志林及平湖志與諸家筆記所載，倭寇所至，村邑

---

[75] 有關日用書的研究，參見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台北：政大歷史系，2001 年。

[76] 如三才圖會中的「倭」，就是鮮明的倭寇表現。

為墟，其屠殺淫掠之酷，與今日如出一轍；是知其國無綱紀，人無禮義，出自性成，今古無殊；三也。戚少保承敗績之後，用鄉兵保土衛國之勇，師出以律，卒戡大亂；民兵之訓練，足為驅寇之資；四也。舉一例他，歷代征倭文獻之蒐集與研討，必於制夷之道有裨；蓋無疑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王君婆楞之此輯，固不僅為供學者之參考已也。夫三十年為世，人事之變化，固多隨時間而異其致；若夫山川險易，則初不於數百年之間而遽有陵谷滄桑之改；抗戰以來，倭人奔突之跡，衡之歷史，往往為古人用兵所由；凡此皆足以見其處心積慮，謀我有素。而吾人今後之言國防，亦不可不於此類史實加以注意；治史學者，或可闢一新塗徑歟。[77]

這段文字成於 1930 年代抗日戰爭爆發的時期，仔細看其內容，我們會訝異的發現，不論在目的或觀點上，它與萬曆年間作品十分神似。用來與中日戰爭作比較的，依然是嘉靖大倭寇。

對處於抗日戰爭下的中國人，日本是非常明確的入侵者。民族情緒高揚之下，許多的歷史學者投入了倭寇史的研究，黎光明便說倭寇問題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才「日益有人」進行研究。[78]從嘉靖大倭寇的研究回顧看來，當代明代倭寇史的研究風潮，的確起於抗日民族意識。王婆愣將他研究倭寇史的原因歸因為：

自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還，國人皆知壓境強敵其名日本，即古之倭人也；文人學士，多縱論於當前；縉紳先生，且預祝於今後；摧敵建國，並執政而競言；福善禍淫，操鬼神之左券；斷金碎玉之文，祭獸驅魚之作，幾與恒河同其沙數；而日本倭人是一是二，倭祖倭裔或賢或庸，則不欲言或不欲知也；其有舉之者，輒稱山海經或徐市童男女云云：中國數千年汗牛充棟之圖籍，又無一有關中倭之首尾記載；吁，可哀也。[79]

---

[77] 王婆愣，《歷代征倭文獻考》（台北：正中書局，1967 年），〈陳立夫序〉。

[78] 黎光明，《嘉靖禦倭江浙主客軍考》，〈自序〉。

[79] 王婆愣，《歷代征倭文獻考》，〈自序〉。

也就認爲國人不知道日本的歷史、事物，典故，因而開始編纂此類史料。然而從他的選材上，這個研究的目的與其說是爲明倭情，不如說是爲鼓舞民族自信心。

從早期的研究中，我們會發現，明代所留下的倭寇印象：「嗜殺、殘忍的日本人」，直接被學者即一般人所應用，成爲對倭寇普遍的定義。筆者並非在批評「倭寇」一詞長期的被誤用，只是想討論在我們研究倭寇時，是否應因時因地的認知倭寇，因爲時、地往往影響著歷史事件的意義。

五、小　結

雖然經歷過嘉靖年代的大倭寇，然而嘉靖年間所留下的「中國人十之六七」的倭寇形象並沒有留傳下來。主要的原因便是萬曆二十年代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所帶來的騷動。萬曆二十年間，距嘉靖大倭寇已四十年，許多人是從未經歷過倭寇的。在迴避制度下，大部分地方官更是從未面對過倭寇的外地人。加上事起於朝鮮，江南所受到的威脅並不大，也因此沒有產生多大的恐慌。然而，「倭寇」這個早已被遺忘的名詞，卻在出版業及地方官的支持之下，突然變成一個眾人迫切得到的資訊。對此時的江南人而言，倭寇已不再是生命財產的威脅，卻變成一種新知。因爲只剩下「殘忍、嗜殺」模糊形象的倭寇，再次介入了江南人的生活之中。

當時各式出版品的出版風潮下，助長了嘉靖大倭寇形象的再建立，倭寇全是日本人，他們都是無知、愚蠢而殘忍、好殺的，靠著中國人王直的領導，才能成功的劫掠東南沿海。此時倭寇出版品充滿了目的性，述說著倭寇不難平定，對日本應採取嚴厲的打擊而非合款；而這個目的性，便完全湮蓋了嘉靖大倭寇的真實面貌。於是，日本倭寇的記憶就這樣地合理化，嘉靖大倭寇這樣一個明代東南沿海的重要的特殊事件，就繼續以 13-16 世紀日本倭寇活動的一部分存在，也因此而有今日如「嘉靖大倭寇的真象」這樣的爭論。

歷史文獻的製造過程不可避免的會帶有作者的主觀，在倭寇史料中更可以看見這個問題。當我們企圖以這些史料來還原嘉靖大倭寇的面貌時，不能不重視他們出版的經緯。就以本章提的及兩部時事小說的內容而言，如果將作者的名字換爲著名的學者官員，或是當時的出版者將其收錄於倭寇出版品中，以其敘述方式與內容來看，根本與筆記或史料無異，也可能就因爲影響了我們研究時的判斷。

擁有眾多流傳版本的王翠翹故事，就是由史料、筆記、小說戲曲所共同創造出來，並且成爲了明代人相信存在的史實。史料與小說的真實性就只在一線之隔，因此在研究時，了解出版的經緯是相當重要的。

參考書目

明代倭寇史料

卜大同，《備倭記》，四川：成都市巴蜀書社，1993 年。

不著撰者，《嘉靖倭亂備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王士騏輯，《皇明馭倭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佚　名，《嘉靖甲寅倭變記略》，上海圖書館藏善本書，版本不詳。

采九德，《倭變事略》，台北：廣文書局，1964 年。

侯繼高，《全浙兵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茅元儀，《武備志》，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

徐學聚，《國朝典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

張　鼐，《吳淞甲乙倭變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郭光復，《倭情考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鍾　薇，《倭奴遺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黃俁卿，《倭患考原》，《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編者不詳，《倭志》，《玄覽堂叢書》，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

蔡汝賢，《東夷圖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鄭若曾，《江南經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鄭若曾《籌海圖編》，收錄於《四庫全書珍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1935年。

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書。

薛俊著，王文光增補，《日本考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

謝　杰，《虔臺倭纂》，《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

正史與雜史

《明史》，台北：鼎文書局點校本，1979年。

《明實錄》，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年。

《萬曆邸抄》，台北：古亭書屋影印，1968年。

王世貞，《弇州史料》，《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陳鶴撰，陳克家補，《明紀》，台北：世界書局，1984年。

筆記、小說、文集

于慎行，《穀山筆麈》，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王世貞，《續異豔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西湖隱叟，《胡少保平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何三畏，《雲間志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何良俊，《何翰林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嘉靖44年刻本影印，1971年。

余繼登，《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佚　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李　遂，《李襄敏公奏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

李　詡，《戒齋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周清源，《西湖二集》，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年。

青心才人，《雙奇夢全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茅　坤，《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

徐　階，《經世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徐學謨，《徐氏海偶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焦　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馮夢龍，《馮夢龍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中文專著

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年。

王　儀，《明代平倭史實》，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4 年。

王婆愣，《歷代征倭文獻考》，台北：正中書局，1967 年。

卡普費雷（Jean-Noël Kapferer）著，鄭若麟、邊芹譯，《謠言》，台北：桂冠，1992 年。

安貝托・艾柯（Umberto Ero）著，黃寤蘭譯，《悠遊小說林》，台北：時報文化，2000 年。

伯來拉、克路士等著，何高濟譯，《南明行紀》，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 年。

利瑪竇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吳重翰，《明代倭寇犯華史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年。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台北：政大歷史系，2001 年。

李　玉、湯重南、林振江著，《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

李　洵，《下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史語所專刊，61，1972 年。

李光濤，《萬曆二十三年封日本國王豐臣秀吉考》，史語所專刊 53，1967 年。

李金明，《明代海外貿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年。

門薩多著，何高濟譯，《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唐力行，《商人與文化的雙重變奏——徽商與宗族社會的歷史考察》，武漢：華工理工大學，1997 年。

高小康，《市民、士人與故事：中國近古社會文化中的敘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編，《小說戲曲研究第三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0 年。

陳尚勝，《「懷夷」與「抑商」——明代海洋力量興衰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1 年。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出版社，1985 年。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路　工，《訪書見聞錄》，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5 年。

鄭廣南，《中國海盜史》，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 年。

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的幾個問題爲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

鄭樑生，《明史日本傳正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年。

鄭樑生編，《明代倭寇史料》，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

黎光明，《嘉靖禦倭江浙主客軍考》，《燕京學報》專號第 4 號，1933 年。

錢　杭、承　載著，《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外文專書

小川尙，《明代地方監察制度の研究》· 東京：汲古書院，1999 年。

小葉田淳，《中世日支交流貿易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41 年。

田中健夫，《倭寇と勘合貿易》，東京：至文堂，1961 年。

田中健夫，《中世對外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1975 年。

田中健夫，《倭寇—海の歷史》，東京：教育社，1982 年。

石原道博，《倭寇》，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 年。

佐久間重男，《日明関係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 年。

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 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中文論文

王鐵均，《明代的倭患與中國的日本學研究》，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 期，2003 年。

石　錦，〈明清時代桐城鄉社會精華分子的社會組成和變化稿〉，《漢學研究》，3 卷 2 期，1985 年。

郝毓楠，〈明代倭變端委考〉，《中國史研究》4 期，1981 年。

張彬村，〈十六世紀舟山群島的走私貿易〉，《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一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年。

陳文石，《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史語所集刊 36 上，1965 年。

陳學文，〈明代的海禁與倭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 期，1983 年。

陳學文，〈論嘉靖時的倭寇問題〉，《文史哲》5 期，1983 年。

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爲中心〉，《復旦學報》1 期，2000 年。

鄭樑生，〈明朝海禁與日本的關係〉，《漢學研究》1 卷 1 期，1984 年。

外文論文

佐久間重男，〈嘉靖海寇史考——王直おめくろ諸問題〉，《星斌夫博士退官

記念中國史論集》，記念事業會，1978 年。

佐久間重男，〈中國嶺南地區の海寇と月港二十四將の反叛〉，《青山史學》5 號，1978 年。

佐久間重男，〈明代の外國貿易——貢舶貿易の推移〉，《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講談社，1951 年。

佐久間重男，〈明代海外私貿易の歷史背景——福建省を中心として〉，《史學雜誌》，62 卷 1 號，1953 年。

秋山謙藏，〈日、明勘合貿易と密貿易〉，《歷史學研究》6 卷 8 號，1936 年。

松浦章，〈徽州海商王直と日本〉，《栃木史學》13 號，1999 年。

中山久四郎，〈「倭寇」的真相〉，《歷史教育》3 卷 8 號，1955 年。

片山誠二郎，〈嘉靖海寇叛亂の一考察－王直一黨の反抗を中心に〉，《東洋史學論集》4 號，1955 年。

片山誠二郎，〈月港「二十四將」の反亂〉，《清水泰次博士追悼記念明代史論叢》，大安，1962 年。

片山誠二郎，〈明代沿海密貿易と沿海鄉紳層〉，《歷史學研究》163 號，1953 年。

片山誠二郎，〈明代海上密貿易と沿海地方鄉紳層——朱紈の海禁政策強行における挫折の過程を通しての一考察〉，《歷史學研究》164 號，1952 年。

李獻章，〈嘉靖海寇徐海行蹟考〉，《石田幹之助博士訟壽記念東洋史論叢》，記念事業會，1965 年。

李獻章，〈嘉靖年間におけろ浙海の私商及び舶主王直行蹟考（上）（下）〉，《史學》34 卷 1、2 期，1961 年。